



于谦的诗品与人品

□ 荆晓燕

于谦（1398—1457年），字廷益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明朝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《明史》评价他：“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”；董其昌称赞他说：“赖社稷之灵，国已有君，自分一腔抛热血；竭股肱之力，继之以死，独留清白在人间”；袁枚在诗中说：“赖有岳于双少保，人间始觉重西湖”；林则徐评价他说“公论久而后定，何处更得此人？”于谦为何能赢得敬仰、广受赞誉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高洁的品格、深沉的大爱以及无畏的担当，这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，其人品与诗品互为表里、交相辉映。

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

于谦在青年时代写下著名的《石灰吟》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这首诗成为于谦命运的注脚、一生的写照，而“清白”也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底色。在明朝黑暗的官场中，于谦始终洁身自好、清廉自持，如一袭白袍，终生未曾沾染污迹，不仅“下不纳贿”，而且“上不贿要”。公元1444年前后，内阁三杨相继谢世，宦官王振弄权，把持朝政，可谓是“朝廷枢府，布列私人；阉党故旧，把持要津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官员对王振趋之若鹜、呼为翁父，而地方大员回京时也多拜见并贿以重礼。当时于谦正巡抚山西、河南，他的下属劝告他回京时也去拜见王振，哪怕带些地方土特产也好。于谦听罢，举起自己的袖子幽默地回答：带有“两袖清风”。为此，他还专门作了一首《入京》：“手帕蘑菇与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其实，历史不仅书写于浩瀚的史书中，也存在于芸芸众生的评判中，“两袖清风”这个典故能够千古流传就是百姓对于谦高洁品格的最高褒奖。于谦自奉俭约，终生廉洁，“及籍没，家无余资，独正室鏊锅坚固。启视，则上赐蟒衣、剑器也”，《明史·于谦传》中的这一段，仿佛是他蒙冤受死之后对大明王朝的无声告白，读来让人震撼、让人感动。

寸心洁白，可以昭垂百代清芬。于谦行为上的廉洁源于他精神上的高洁。他所看重的不是物欲，而是名

节。他在诗中说：“名节重泰山，利欲轻鸿毛”，“但令名节不堕地，身外区区安用求”。有时，他也能感受到在举世流俗中洁身自好的艰难，但还是像柏树一样“节操棱棱”。其《北风吹》一诗就表达了内心的这种坚毅：“北风吹，吹我庭前柏树枝。树坚不怕风飘动，节操棱棱还自持。冰霜历尽心不移，况复阳和景渐宜。闲花野草尚葳蕤，风吹柏树将何为！北风吹，能几时？”只要心中坚守着对于暖春的信仰，就不会畏惧严冬的侵袭。于谦时时不忘敦品修德、砥砺节操，在他的诗作中，我们经常能看到明月清风、茂林修竹、秋菊冬梅这些经典意象。他笔下的夜空“明月扬素辉，修篁散疏影”，他笔下的山峰“幽崖树色经霜古，绝顶松涛入夜惊”，他笔下的秋菊“晚香好在东篱菊，相伴秋霜入鬓华”，他笔下的梅花“清白可能陪雪月，孤高元不惹尘埃”，读来让人感觉表里澄澈、神骨俱清。于谦生活的时代，正是“恢张皇度，粉饰太平”的台阁体盛行之际，但是他的诗歌却别具一格、风致卓然，为当时寂寞的诗坛增添了一股清正浩然之气。

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

在于谦的诗歌中，有一首诗与《石灰吟》齐名，但其歌咏的对象与清白的石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这就是《咏煤炭》：“凿开混沌得乌金，藏蓄阳和意最深。爝火燃回春浩浩，洪炉照破夜沉沉。鼎彝元赖生成力，铁石犹存死后心。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。”“煤炭”这个意象在诗歌中很少出现，于谦之所以歌咏它，是因为看中了它所独有的品质，它不仅能够带来“燃回春浩浩”的温暖，而且能够带来“照破夜沉沉”的光明。诗以言志，于谦所追求的就是为百姓苍生带来温暖和光明，其为民的情怀和深沉的大爱是他一生勤政济世的原动力。从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到郑板桥的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从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到于谦的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，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“官”。

公元1430年（宣德五年），于谦

擢为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、山西，从此在太行山脉度过了数十年的仕宦生涯。在此期间，他为了实践“苍生俱饱暖”的政治理想，在晋豫两省“不辞辛苦”地奔忙。他刚刚上任，就“轻骑遍历所部，延访父老，察时事所宜兴革，即具疏言之”。为了把问题搞清楚，往往是“朝在太行南，暮在太行北”，甚至除夕之夜也忙于政务，“不是五更闻爆竹，那知今日是新年”。虽然离乡千里、政务繁忙，但于谦也是毫无怨言，“民安足遂中心愿，年壮何妨到处家”。作为地方官，于谦心系黎民，“贫者为宽征，饥者为发粟。善良加抚摩，豪强使偃服。闾里无横科，仓廩有馀谷”。此外，他还兴修水利，筑路铺道、植树挖井、贷粮济贫、施药救难，政绩卓著，境内大治。当地百姓感念于谦的恩德，直呼为“于龙图”，当地流传的歌谣中有“天遣贤官拯二方”之句，足见其民望之高。公元1446年（正统十一年），于谦被王振罗织罪名下狱，后虽获释，但由三品巡抚降为四品大理寺少卿。“山西、河南吏民伏阙上书，请留谦者以千数”，王振迫于压力只好让于谦官复原职。于谦在巡抚任上，心忧百姓、为民请命；当他蒙冤入狱，民众不惧压力为他声援，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幕动人的篇章。

“凛凛英风震百蛮，巍巍砥柱屹狂澜”

于谦在《和何知县交趾死节韵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凛凛英风震百蛮，巍巍砥柱屹狂澜。自缘忠义存心正，不惜从容就死难。”这“凛凛英风”的果敢刚毅，“巍巍砥柱”的无畏担当，正可以形容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。公元1449年（正统十四年），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军进犯明朝边境，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。于谦最初也在随军出征的名单中，但是他上书极力反对英宗亲征，结果王振一怒之下把他从名单中划掉了。这也许是王振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，正是这一笔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运。“土木堡之变”中，英宗被俘，明朝精锐部队全军覆没，也先率50万大军乘胜而来，兵锋直指北京。消息传来，京师震动，恐慌蔓延，甚至有官员提议将都城南迁至南京。国家真的到了危难存亡之际，而于谦就是力挽

狂澜令金瓯无缺的中流砥柱。风雨飘摇中，于谦站出来了，他满怀悲愤地说：“言南迁者，可斩也！京师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，独不见宋南渡事乎！”众望所归，人心所向，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守以及对瓦剌的军事作战指挥。首先，他火速调动兵马保卫北京，包括“两京、河南备操军”“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”以及“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”，从而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。然后，他联合众臣拥立郕王为帝，重建领导核心，摧毁了也先挟持英宗要挟大明的图谋。最后，他灵活运用伏击战、阵地战、游击战等多种战术，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。

北京保卫战是于谦一生中的高光时刻，其中最闪耀的光芒就是他的担当精神。在危难之际，调度兵马、重建领导核心、亲自指挥战斗，哪一步都充满风险，哪一步都容不得有闪失，否则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。其中风险于谦岂能不知，但国难当头，惟有勤力向前，岂能明哲保身？于谦的心中，国家民族、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是最重要的，危险险重之际更要敢于任事、勇于担当。担当是一种信念和使命，而当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，担当又会化成一种无上的勇气和力量。这种精神在其诗歌中多有体现，如“孤臣不为一身惜，降将应怀万古羞”“等闲吸尽四海水，化作商霖拯旱乾”等都反应了他迎难而上、以身许国的抱负，浩然正气充塞天地。

关于于谦的诗品与人品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一段评论可谓全面而中肯：“谦遭逢厄运，独抱孤忠。忧国忘家，计安宗社。其大节炳垂竹帛，本不藉文字以传。然《集》所载奏疏，明白洞达，切中事机。较史传首尾完整，尤足觐其经世之略。至其诗风格道上，兴象深远，虽志存开济，未尝于吟咏求工，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，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。”于谦为人，品格高洁、胸怀大爱、勇于担当；于谦为文，表里澄澈、风格遒劲、正气浩然，其人品与诗品交相辉映，并垂不朽。



先秦思想史的天空群星闪耀，韩非即是其中的一颗。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，他构建的法家思想，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，形成了外儒内法的传统政治格局。然而两千年来，韩非及其思想备受争议。今天，如何辩证认识评价韩非及其思想，汲取精华，剔除糟粕，是当代韩非思想研究的意义所在。近年来，以解构和建构的方法研究韩非思想，对比观照中西文化，贯穿古今、融会中西、还原韩非真面目，发掘法家精神，逐渐成为韩非思想研究的创新方法。

创新经典解读范式，阐发义理。创新经典解读范式的显著特点在于，突破以往长于考订文本而疏于思想诠释的注释体，秉持一贯的解构建构写作方法，重在义理阐释，力求经典思想的贯通解读。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夏海的《韩非与法治》，立足经典文本，以法、术、势为纲领，搭建全书框架，分章节探讨了韩非思想中的人性论、法治思想、术治思想、势治思想，通过对比先秦儒家、道家、墨家诸子思想，分析韩非思想兴起的渊源和历史背景，展现了战国时期思想繁荣、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，进而对韩非及其思想作出整体评价。作者夏海注重“知人论世”，开篇专章介绍韩非所处的历史环境及生平活动，将韩非的言论、主张置于具体历史情景之中，有助于读者真正读懂、理解韩非。在写作理念上，作者遵循学术性和通俗性相统一的原则，在学术与普及之间实现平衡。专业研究者读后不觉得浅，可以从中得到启发，进一步推进韩非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；普通读者看了不觉得深，深入浅出的解读、典雅通俗的文风，将读者带进了一个丰富多彩、复杂多变的韩非思想世界，推动韩非思想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。

以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研究韩非思想。将韩非思想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中考察，有助于在中西观照中寻找异同、比较优劣，丰富认知视角，增强认识问题的层次和深度，从而更好体现高度的学术自觉。当今中国是个开放的社会，无论学问还是实务，都应有宽广视野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观照，在比较研究中找到定位；对于思想学术而言，比较中的同一，使我们对不同文明能够和谐共处有信心，而差异则是不同文明进步和共同发展的动力。以《韩非与法治》为例，其所秉持的创新研究方法即遵循这样的思路，从时间和思想内容两个维度分别将韩非思想与古希腊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“三杰”思想和马基雅维利思想进行对比。在时间维度上，按照雅斯贝尔斯“轴心时代”理论，古希腊文明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最好的参照物。在思想内容维度上，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及其《君主论》的政治思想是研究韩非及其思想很好的参照物。因此，这种创新研究方法得以聚焦哲学、政治学研究中最基本、争议最多的人性论，深入探讨韩非及先秦诸子思想与古希腊“三杰”的异同，分析了中国重人文、西方重自然的文化传统，启发读者思考中西政治思想文化差异之大的根源，从思想前提、主题内容等多方面对韩非与马基雅维利进行对比分析。这两位思想大家时间上相隔千年、地域上相隔万里，思想却息息相通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令人感叹人类思想的伟大共通。

以韩非思想为主线，却又不限于韩非思想。在历史长河中，任何思想学术流派都是在同一与差异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进步的。研究韩非思想必然要研究与之相关的诸子思想，看到他们的同一与差异，既立足韩非看韩非，又跳出韩非看韩非，这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。创新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建构先秦思想史的大厦，整体把握先秦思想史，了解传统中国治道。以韩非与法治立论，对比儒道墨诸家相关思想，推演出诸多关于中国古代人物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基本观点，讲清韩非与法家外部诸子继承和创新的关系，讲清韩非与法家内部商鞅之法、申不害之术、慎到之势的承继和超越关系。以此揭示出，韩非思想形成的最大特点是在方法论上既批判又吸收前人的思想；韩非思想源自先秦法家不同派别；诸子百家思想是韩非的根基，道家、儒家、墨家思想也是韩非的重要源头。

辨析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。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素和单位，反映客观事物的一

今天该怎么研究韩非

□ 郝英明

般属性和本质特征，是研究思想家及其理论体系的入门路径。研究韩非的法治思想，首先要厘清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法治、德治、礼治、人治等概念，回应对韩非之法与现代法治关系等备受关注的问題。比如，从政治制度、政治权威、政治平等方面分析现代法治与韩非之法的不同，指出韩非法治的缺陷。尽管关于韩非之法是否要求君主不得凌驾法律之上、法家的法治本质是否为入治等问题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，但以时代的视角解读韩非思想，将更好地为这一学术争论提供更全面的认识视角。《韩非与法治》分析了现代民主的渊源、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差异，比较了民本与民主思想，指出民主不仅是理念，更是一种国家形态和政治制度。这种创新的研究方法对概念的理析并非简单释义，而是注重概念的起源与流变、相似概念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，善于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，构筑起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概念框架。

秉持“了解之同情”的态度。韩非学说有不可避免的缺陷，很多思想确实缺乏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。然而，韩非集法家、性恶和好利于一身，历史上经常处于被批判之列，即使有些合理思想，也常常被忽视，就像西方谚语所言：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了。《韩非与法治》对韩非思想中的糟粕给予了深刻批判，同时也对误读韩非之处进行了辨析。如在人性论方面，世人常常将韩非的人性好利观视为唯利是图、放任好利，但事实上，韩非是跳出善恶评价的分析框架，以比较客观冷峻的眼光洞悉人性好利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家人性论，并不主张放任好利的本性任由其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乱跑、恣意妄为。因此，在批判扬弃韩非术治时，应更深入地解析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，并有分析有比较有批判地加以借鉴，将这些合理因素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条件下，重视其所蕴含的智慧和理性，对先贤思想予以辩证取舍。

研究韩非思想的创新方法是打开韩非思想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。以严谨公正的治学原则以及谦恭之心研究先贤原典，摒弃偏见、从容淡定、客观冷静地评价韩非及思想，顾及韩非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身世背景。这将带领我们重新认识韩非多面、复杂、深刻的思想，进一步探寻先秦思想文化资源和中西文化异同，进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，认识中国古代政治，从先贤思想中汲取营养和智慧。

学会包容

□ 王杰

包容是什么？包容是容纳，是宽容。容纳与自己不同的观点，宽容别人的失误。包容是一门学问，是一种美德，是一种境界。

为什么包容如此重要？因为包容能让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群之间、人与国家之间关系和谐融洽、幸福安宁、祥和美满。中国名人贤士数不胜数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包容。包容让他们被世人所称赞，被后人所效仿。

说到包容，就不得不提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蒋琬。蒋琬与诸葛亮、董允、费祎合称“蜀汉四相”。蒋琬被当世人敬重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才能，更是因为他的包容。

蒋琬当时有一个部下叫杨戏，此人平时沉默寡言，不擅长与他人

交流。每次蒋琬与杨戏交谈，杨戏都回以沉默。时间久了，有个叫杨敏的人就对蒋琬说：您身为杨戏的上司，他本来就应该尊重您。可您每次和他交流时，他都沉默不语，他也太傲慢无礼了。

蒋琬听到这番话之后，并没有因此对杨戏心生不满，而是回答说：人心各有不同，各如其面，表面上顺从而背后里反对，是古人所畏惧的。杨戏若是赞美我，那就是违背了他的本心；若是反对我，则会显出我的错误，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不语，实在是个痛快人啊。

对杨戏的沉默，蒋琬选择了理解和包容，并站在杨戏的角度为其考虑；而对杨敏的恶言挑唆，蒋琬依然选择了正视指摘，并包容了杨敏对杨戏的诋毁。

杨敏是一名督农官，喜欢背后议论人。有一天，杨敏与同僚议论起蒋琬来，同僚都一致夸奖蒋琬，有的人将蒋琬和诸葛亮比量齐观。听到这里，杨敏十分不满，说：新相虽然有德有才，但是怎么能与前人相比呢？在我看来，新相做事有些糊涂，实在比不上已故的诸葛亮丞相。

有人将杨敏的话告诉了蒋琬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蒋琬会治杨敏的罪，但蒋琬却说：我的确不如前人，所以杨敏并没有说错。而他所说的做事糊涂就说明我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并不恰当。

后来，杨敏犯罪入狱，大家都认为蒋琬会赐死杨敏，但蒋琬只是依法办事，并没有给杨敏加罪。

蒋琬的包容，包容的是他人对

自己的沉默，包容的是他人对自己的诋毁。但真正广泛意义上的包容绝不仅是如此，包容既是不计前嫌，也是和而不同、求同存异。

包容是和而不同，是海纳百川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意思就是天下万物能一同发育而不相互伤害，各种行为准则能同时进行而不相互矛盾。这其实也是包容的另一种表现。这一点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，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